

○话语分析

编者按：“话语分析”是本刊多维度研究语言的一个综合维度。20世纪后半期以来，话语之所以凸显为多学科同时关注的焦点，是因为语言既是交际工具，又是“人类存在的家园”。无论透彻研究工具语言的本质，还是通过语言逆向揭示人及人的世界，都须要直接展开话语分析。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可以细分为两个板块。郑海翠博士与张迈曾先生合作的《和谐理念的多模式话语建构》探讨人赖以存在的基本方式——观念“和谐理念”的多模式话语建构。其余两篇文章则是通过话语分析来揭示话语含义的成果。“话语分析”将成为本刊的重点栏目之一，欢迎广大学者赐稿。

和谐理念的多模式话语建构^{*}

郑海翠 张迈曾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提 要:多模式是话语的基本属性,而决非一个新现象,但这一基本属性却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话语的多模式性越来越突显出来,有关多模式话语的研究也被排上语言学家的研究日程。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话语通过各种符号模式的共同作用参与社会建构。本文应用多模式话语和批评性社会符号学理论来分析北京申奥会徽中所传达的和谐理念。

关键词:多模式话语;批评性社会符号分析;和谐理念;北京申奥会徽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8)02 - 0107 - 6

Multimodal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Harmony

Zheng Hai-cui Zhang Mai-ze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Multimodality of discourse is by no means a new phenomenon, but instead can be seen as an intrinsic attribute of discourse. And it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multimodal discours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alient and research about it has now been put on the agenda of linguists. As a social practice, discourse plays a role in social construction by means of the intersemiosis of various media modes. This paper analyses how the concept of harmony is constructed through multiple modes which use the Beijing Olympic bidding emblem.

Key words: multimodal discourse; critical social semiotics; the concept of harmony; Beijing Olympic bidding emblem

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不仅是实现社会权力和实施控制的手段,而且是构造社会文化和现实的工具。话语通过各种符号交际方式实现,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本文以北京申奥会会徽为例,分析中华民族信奉和追求的和谐思想如何通过多模式话语建构。

1 中国和谐理念与奥运精神:世界和谐的一个呼声

和谐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天人合一”、“和为贵”、“和而不同”、“大同社会”等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理想与追求。中国传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言权势与社会和谐转型期中国机构语言的社会效果研究”(05BYY042)的阶段性成果。

统文化提出的这种和谐共生理想已经成为以“和”为核心,兼顾多元、和谐有序、包容开放的一套哲学伦理体系。它不仅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和日常生活,而且影响着中国的外交决策,决定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建设和谐世界、实现共同发展是中国一贯主张和力求实现的理想。

奥运会是世界范围内的体育竞技比赛,其目的是弘扬“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而申办和举办奥运会却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经济和科技实力以及文化魅力的展现,2001年7月13日中国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这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国际地位提升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魅力再现。

在北京申办和筹备奥运会的过程中,展示和突出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一直是各项工作的一个重点,和谐理念可谓重中之重,因为和谐理念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其精神实质又与实现世界和平与和谐发展的奥运会宗旨是一致的。在莫斯科作申奥陈述时,李岚清副总理就代表中国政府陈述了中国在体育设施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如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了36个体育场馆;并表示“如果北京奥运会有赢余,我们将用这赢余建立奥林匹克友谊合作基金,用以资助发展中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充分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及中国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一贯作风。本文将申奥会徽“太极人”为例,分析中国传统和谐理念的多模式话语建构。

2 理论背景

2.1 多模式话语的普遍性

首先提出术语“多模式话语”(multimodal discourse)的是 Kress 和 van Leeuwen (1996/2001)。然而,话语的多模式性(multimodality)并非是一个新现象,只不过人们一直以来在实践甚至理论研究中总是趋向于关注一种模式而忽略其他模式,人为地将各种交际模式区分划界,导致单一模式研究成为主流,例如,语言学家只关注语言表达,而将文本中出现的图像留给艺术家去分析。这样,图像建构的意义以及只有通过两种模式共同作用才能表达的意义就被置于边缘地位或者被完全忽略了。

其实,多模式可谓无处不在。即使在所谓的“单一”模式文本中,如口语表达或书面文本中,多模式仍然存在。但是人们往往只关注语言这种

模式,而将其他的意义建构模式(如语音、语调、环境等)归为副语言特征或语境因素,或者干脆认为其他模式(如文字的排版或书写方式等)与语言研究无关。实际上,这些符号模式也参与意义表达,它们属于意义构建的不同层次。“语言使用,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总是不可避免地由多种交际模式构建”(Scollon & Levine 2004),所以,“所有的文本都是多模式的”(Kress & van Leeuwen 1998: 186)。

跨越界限成为20世纪符号学研究的一大主题,“意义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构建,并且总是通过在一个交际集合中共现的许多不同的模式和媒介构建”(Kress & van Leeuwen 2001: 111)。随着现代科技和传媒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意义的多模式建构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由一个人来完成,例如,文本制作者可以为文字表达选择不同的字体、格式、背景等,可以加载图像,如一个笑脸符号:表达自己的心情,甚至可以加入音乐等制作动画文本,因此话语的多模式也越来越突出。

2.2 有关多模式话语的理论构想

Kress等提出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分析多模式文本的构想和原则:(1)任何文本的生成和阅读都涉及几种符号模式;(2)每种模式都有其内在的表征和交际潜势,这种潜势同时又受文化影响;(3)要了解多模式文本的阅读方式,即多模式文本是如何实现内部衔接和连贯的;(4)就文本而言,生成者和阅读者都有权利;(5)写作者和阅读者都生成符号合成物,即文本,文本由文本生成者的利益决定;(6)利益涉及一系列因素:社会历史、文化历史,当前的社会语境包括符号生成者对交际环境的评估;(7)要实现恰当表征和有效交际,符号生成者就会选择恰当的能指(形式)去表达所指(意义),因此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而是机动的(Kress *et al* 1997: 269)。可见,上述(1)强调文本的多模式属性;(2)突出意义表达的动态性和社会性,语言和其他表达模式都是一个意义潜势、语义系统;(3)指出多模式文本的编排方式及阅读规则;(4)强调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产生和理解的;(5)指出写作和阅读都是一个符号组建过程,写作是将符号组建的结果公之于众,阅读则是内在地将符号组建解码,再构造的过程,文本由制作者的利益决定;(6)列举决定文本利益所涉及的种种因素;(7)指出符号运用及其意义表达由利益驱使,并不是任意的。

传统语言学将语言定义成一个双层表述系统

(double articulation),即信息可以被表述为形式和意义两个层面。Kress & Leeuwen认为多模式文本的意义是多层次表述(multiple articulation),他们提了意义建构的4个层次:话语、设计、生产和分配(Kress & Leeuwen 2001)。话语是在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关于现实或现实某个方面的知识;设计是符号资源的使用,是关于符号产品和符号事件的形式构想,设计同时运用各种符号资源或模式实现话语和各种活动;生产是符号产品或符号事件的物质形式表述(无论是原型还是最终产品);分配则是利用物质资源对符号产品和符号事件进行技术加工或再编码,目的在于记录或传播符号产品和符号事件。话语和设计属内容层面,生产和分配属表达层面。“多模式指的是符号产品或符号事件的设计中几种符号模式的使用以及模式整合的方式”(Kress & Leeuwen 2001: 20),例如,模式间相互增强、补充或等级置放(其中一种模式占主导,其他模式添加意义)。

2.3 交际的社会符号学理论

社会体系或文化可以表述为一种意义建构、一种符号系统,构成社会体系的意义是通过许多模式和渠道传递的,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交际模式,决非唯一的交际模式。除语言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符号模式(Halliday 1978/2001: 189)。Halliday重点研究语言这种符号系统,并提出系统功能语法(Halliday 1994/2000),认为语言材料可以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分析。Kress和van Leeuwen认为三大元功能并非仅限于语言系统,而是适用于整个社会符号交际系统,他们将Halliday研究的语言系统的三大元功能扩展到图像分析(Kress & van Leeuwen 1996)。下面,我们将Halliday的语言分析语法和Kress & 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列图表示:

符号模式	功能	子系统
语言	概念	及物性、语态、归一性
	人际	语气、情态
	语篇	主位、信息、衔接
图像	再现	叙事再现、概念再现
	互动	接触、距离、态度、情态
	编排	信息值、显著性、组织

关于语言和图像三大元功能及其子系统通过哪些具体的方式实现,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详细介绍,具体可查阅Halliday(1978/2001),Kress & van Leeuwen(1996)和李战子(2003)。从上图可以看出,尽管所用术语有差别,但语言和图像系统

所实现的交际功能基本相同。同时,三大元功能的具体实现手段会有很大的差别。例如,语言行为动词在图像中由箭头、目光等向量实现,语言用介词表示方位关系,在图像中通过前景和背景的设置表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语义关系都可以通过图像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图像意义都可以用语言表达(李战子 2003)。例如,心理过程和名词化结构为语言所特有,视角是图像独有的。语言和视觉交际相互独立,并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实现构成社会现实或文化的意义体系,由于所表达的意义同属一种社会文化,所以不同的交际模式有很大程度的相容性;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符号模式的意義潜勢有各自的优点和局限(Kress & van Leeuwen 1996),所以只有几种模式共同作用,话语才能实现准确、全面和高效的意義表达。

2.4 批评性社会符号学:批评话语分析和符号学的融合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由Fowler, Hodge和Kress等人发起的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是在对主流语言学和社会变异研究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流语言学研究语言系统或人的语言能力和习得,批评语言学研究与社会密切相关的语言运用,认为语言不仅反映社会现实,而且参与社会现实构造(Fowler, Hodge, Kress & Trew 1979; Fowler 1986/1991)。批评语言学应用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言表达所传达的社会意义以及语言如何建立和维系社会权利关系。

在批评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突破语言学的范围,接受社会学中的“话语”概念,认为话语是社会实践形式,是社会实践的符号成分(Chouliarakis & Fairclough 1999)。批评话语分析进行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和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研究,例如, Fairclough有关语言和权利以及社会变革的研究(Fairclough 1989/1992),Wodak的“历史-话语研究”(2001),van Dijk的话语-认知-社会研究(2001)等。尽管批评话语分析丰富和发展批评语言学,分析框架也不断推陈出新,但系统功能语法仍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语言分析手段。

在话语实现方式上,尽管Fairclough(1992/1999/2003)和van Dijk(1998)都提出话语包括口语、书面语以及非语言交际等,但他们都致力于语言这一符号模式研究。批评语言学的创始人Hodge和Kress(1988)开始关注语言以外的其他社会符号研究,并将社会符号研究同批评话语分

析联系起来。在“语言是社会符号”(Saussure 1971/2000, Halliday 1978/2001)的理论基础上, Kress和 van Leeuwen提出图像语法,首次将系统功能语法扩展到语言以外的其他社会符号研究中(Kress & van Leeuwen 1996),这是对 Saussure 和 Halliday 的语言符号学思想的发展。

1999年在伯明翰大学召开的一次批评话语分析大会上,针对批评话语分析仅仅局限于语言这一种符号模式而忽略其他符号模式这一现象,与会者提出应该将批评话语分析与社会符号学结合起来的倡议,要求将多模式置于话语分析者和社会理论家的研究日程上,以弥补批评话语分析只关注语言而忽略其他话语模式的缺陷,并将这一新的研究方向称为批评性社会符号学(critical social semiotics)。Caldas-Coulthard 和 van Leeuwen将批评性社会符号学定义为批评话语分析和符号学的融合(interface),并将其特点分析为:

(1)关注含语言在内的各种交际模式;(2)将意义建构同教育、跨文化交际等社会主题联系起来;(3)加入批评话语分析事业,分析多模式话语在社会现实的生产、再生产和改造中发挥的作用。(Caldas-Coulthard & van Leeuwen 2003) Chouliaraki也称,多模式话语分析并非与批评话语分析决裂,而是一个新的开端(Chouliaraki 2004)。多模式话语分析研究各种符号形式如何表达意义并参与社会建构。

批评性社会符号学充分考虑到话语的多种实现方式,因而是在语言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从语言研究到话语研究之后的又一次突破,它使多模式话语分析走向深入,同时也使批评话语分析得以丰富。批评话语分析既应该研究作为权利和控制手段的话语,也应该研究作为建构社会现实工具的话语(van Leeuwen 1993),同样,多模式话语既参与社会结构和权利关系的建构、维护或改造,也是社会现实的构造工具。

3 从申奥标志看和谐理念的多模式话语建构

在申办奥运会期间,中国人设计了一个形象生动、寓意深刻的申奥标志“太极人”。申办会徽及文字说明构成多模式文本。



会徽说明:申办会徽由奥运五环色构成,形似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品的“中国结”,又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图案行云流水,和谐生动,充满运动感,象征世界人民团结、协作、交流、发展,携手共创新世纪;表达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

我们先分别分析图像和文字,然后再分析这两种模式如何共同作用表达意义,重点分析其中所表达的和谐理念。

3.1 图像分析

图像由意象、文字和奥运会标志三部分组成,我们先逐一分析,然后分析图像编排。

奥林匹克五环标志是由皮埃尔·德·顾拜旦1913年构思设计的。它是世界范围内最为人们广泛认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标志。5个不同颜色的圆环代表参加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5大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每一个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家都能在自己的国旗上找到至少一种五环的颜色,可谓在保持各国特点的情况下,于差异中寻求共同点。5个圆环大小完全相等,表明5大洲的平等,环环相扣象征5大洲团结合作,携手共建美好、和谐世界。

“BEIJING 2008”在上方,以加粗、黑色印刷体出现,而且所有字母均为大写体,Candidate City在下方,以小字号,非粗体出现,首字母大写,两行文字的位置、字体、字号、大小写等的不同和对比使得BEIJING 2008获得显著性,突出申办城市,而Candidate City仅说明此会徽为申办会徽。

最上端是意象,其概念再现功能通过象征过程实现,这意象意义丰富,是个承载者(carrier),它既是一个中国结,又是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这样,意义通过象征过程中的暗示(symbolic suggestive)实现,即意义来自承载者自身的品质。中国结是中国民族文化独有的文化精髓,年代久远,文化底蕴丰富,已演化成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同时中国结又可以使抽象的概念化为具体形象(易思羽 2005),中国结最大的特点是从头到尾用一根丝绳完成,因而是表达团结、和谐、力量和美好的文化符号,北京申奥会徽的形状是一个中国结,一个“同心结”,色彩采用红、黄、蓝、绿、黑,即奥运五环色,两种模式(形状和颜色)共同表达5大洲团结一致、合作交流,共创美好世界的愿望和意义。太极人形既体现运动精神,又传达深奥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太极思想反映中华民族追求阴阳平衡,实现人自身的平衡协调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太极人形在上,文字居中,奥运五环位于底

部,这样的编排方式是一种纵向三联画 (vertical triptych):

ideal
mediator
real

(Kress & van Leeuwen 1996: 211)

“理想的”(ideal)往往是信息的理想化的或概括性的精髓,因此也是最显著的部分,“真实的”(real)是具体(如细节等)、更实际的信息(Kress & van Leeuwen 1996: 193 - 194)。奥运会五环标志已为世界熟知,是确定、具体的信息,它所传递的世界团结合作、携手共同发展的理念是每一届奥运会的宗旨和目的,BEIJING 2008 和 Candidate City 是中介 (mediator),意即通过北京 2008 奥运会,奥运精神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将出现一种新的世界和平、和谐的图景,这就是被放置于顶部的意象想要传递的信息,中国人民期盼五洲同心,共同发展,这也是北京奥运会的目的和理想。

整个图像是在提供信息,说明会徽的用途及具体的申办城市,而且传递北京申办奥运会的理念,中国人民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和对世界和谐相处的渴求和期盼。

3.2 文字说明分析

会徽文字说明全部为关系过程,既有识别式关系过程(构成、形似、又似、象征、表达),又有属性式关系过程(如、充满)。图示如下:

申办会徽	由.....构成	奥运五环色
形	似	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品的“中国结”
同上(省略)	又似	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
图案(省略)	象征	世界人民团结、协作、交流、发展,携手共创新世纪
同上(省略)	表达	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
标记/被识别者 (token/identified)	识别式: 内包 (identifying: intensive)	价值/识别者 (value/identifier)

图案	如	行云流水
同上(省略)	(零位动词“是”)	和谐生动
同上(省略)	充满	运动感
载体(Carrier)	归属式:内包 (attributive: intensive)	属性(attribute)

文字部分全部采用陈述语气,提供信息。整段文字共享一个主题:申办会徽,但小句的主位安排有所不同,第一小句主题即主位,其他小句以“形”、“图案”等会徽的细节为主位,更多的小句则采用标记主位(和谐生动、充满、象征、表达等),对会徽的意义进行阐释,突出会徽表达的世界和谐相处、共创美好未来的思想——“世界人民团结、协作、交流、发展,携手共创新世纪”。

3.3 意义共建

这一多模式文本采用图像在上、文字在下的编排方式,这样的安排与从上至下的阅读路径相一致,同时也符合人们的认知和感知习惯。分析可见,这一多模式文本由图像、文字、色彩、字体等多种符号模式共同作用生成,每种模式都有自己的意义表达方式,图像简洁生动、意义丰富,如 5 种色彩的两次巧妙使用,五环环环相扣等;文字阐释详细、具体确定,如会徽说明赋予意象“同心结”、“太极人形”等称谓,使其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并以此引导人们去解读意象的深层含义。当然,每种模式又各有局限性,与图像相比,文字不具备吸引观众目光、迅速传递信息的优势,所以会徽要以图像为主,此外会徽说明只解释图像部分的意象,而未说明五环和 BEIJING 2008 等文字的编排和意义。因此,只关注一种模式或几种模式,忽略其他模式,意义就会部分缺失。

4 结束语

话语的多模式性近年来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为数不多。本文在介绍多模式话语和批评性社会符号学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中国传统的“和谐”理念如何通过多模式话语建构和传播,北京申办 2008 年奥运会是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其悠久文化传统,塑造中国世界大国国际形象的契机。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北京申奥会徽为例,实例分析多模式话语,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多模式话语,推动多模式话语研究进一步发展。

注释:

这里,过程的识别和确定参考了彭宣伟(2000)关于英语和汉语各种过程的对比研究。

参考文献

李战子. 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 [J]. 外语研究, 2003(5).

彭宣伟. 英汉语篇综合对比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易思羽. 中国符号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Caldas-Coulthard, C. R. & Van Leeuwen, T. Critical Social Semiotics: Introduction [A]. *Social Semiotics* [J]. 2003.

Chouliaraki, L. & Fairclough, N. *Discourse in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ouliaraki, L. Watching 11 September: the Politics of Pity [J]. *Discourse & Society*, 2004, 15.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Longman, 1989.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Fairclough, N., Jessop, B. & Sayer, A. Critical Realism and Semiosis [A]. In J. M. Roberts and J. Joseph (Eds.). *Realism, Discourse and Deconstruction* [C]. London: Routledge, 2003.

Fowler, R., Hodge, B., Kress, G. & Trew, T. *Language and Control* [M]. London: Routledge, 1979.

Fowler, R. *Linguistic Criticis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Fowler, R.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M]. London: Routledge, 1991.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s: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dward Arnold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78 / 2001.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Edward Arnold / Beijing: Foreign Lan-

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4 / 2000.

Hodge, R. & Kress, G. *Social Semiotics*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Kress, G., Leiter-Garcia, R. & van Leeuwen, T. Discourse Semiotics [A]. In van Dijk, T. (ed.) *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Volume 1) [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Kress, G. &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Kress, G. & Van Leeuwen, T. Front Pages: (The Critical) Analysis of Newspaper Layout [A]. In Bell, A. & Garrett, P.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C]. Oxford: Blackwell, 1998.

Kress, G. & Van Leeuwen, T.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Arnold, 2001.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72 / 2001.

Scolton, R. & Levine, P.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 Confluence of Discourse and Technology [A]. In Levine, P. & Scolton, R. (eds.). *Discourse and Technology: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C].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4.

Wodak, R.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A]. In Ruth Wodak & Michael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Sage, 2001.

Van Dijk, Teun A.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M]. London: Sage, 1998.

Van Dijk, Teun A.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A]. In Ruth Wodak & Michael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Sage, 2001.

Van Leeuwen, T. Genre and Field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Synopsis [J]. *Discourse & Society*, 1993 (4).

收稿日期: 2007 - 05 - 19

【责任编辑 李洪儒】